

# 情報、人員和物資的 樞紐：1930至1940年代 香港與中國共產革命

• 賀碧霄

**摘要：**從1930年代開始，香港逐漸成為連通上海與中央蘇區的情報、人員與物資的重要中轉站。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中共通過成立香港分局和利用《華商報》等宣傳機構，使香港逐漸成為中共海外統戰的中心城市。本文憑藉中共中央檔案、英國殖民地部 (Colonial Office) 和美國中央情報局 (CIA) 解密檔案，從情報傳遞、人員運輸等角度，理解香港在中國共產革命傳播網絡中的關鍵連接點作用，以及隨着戰爭與革命的推進，香港在網絡中重要性日漸增長的過程。以香港為樞紐，中共打開了由農村通往城市、由城市通往東南亞地區的渠道，並維持着與蘇聯的聯繫。中共利用香港獨特的地理位置和相對自由開放的空間，改變了中共革命的信息與宣傳網絡圖景。

**關鍵詞：**香港 中共 宣傳 革命 網絡

香港與中國共產革命的關係，歷來為研究者所關注。從中共作為執政黨卻在香港保持地下身份至今的奇特現象出發，相關研究追溯了中共組織在香港的歷史起源，以至其對當代香港和中國大陸政治生態的影響<sup>①</sup>。除了這些研究以外，葉漢明對1940年代旅港中國民主同盟 (民盟) 政治立場逐漸激進直至全面左轉，以及民主化運動逐漸被邊緣化的研究<sup>②</sup>；袁小倫對1940年代後期中共成功利用香港進行統戰和宣傳的策略的剖析<sup>③</sup>，都說明了不能將香港歷史研究去政治化，尤其必須正視其對中共革命勝利產生的重大作用。

但是，在中國革命史領域中，有關中共領導的革命的討論，多從農民革命視角出發，認為成功動員農民是中共革命取得勝利的關鍵。相對於中共對

\* 本研究得到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利希慎訪問學者計劃」(Lee Hysan Visiting Scholar Scheme)、中國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建國初年上海私營報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項目編號：12CXW006)和中央高校基本業務費項目「日本在華新聞紙調查」(項目編號：17000-31610126)的資助。感謝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助理主任高琦博士為本研究資料採集提供的便利。

農村地區革命的重要性，中共在城市中產生的影響就目前的研究而論，通常被認為是中共成功統戰黨外知識份子和民主人士的過程。另一方面，研究中共宣傳制度與宣傳機制的文獻，也多關注農村等信息環境較為封閉的地區，如中共在延安時期對內整風與對外政治宣傳，以及建國之後進行的各類政治運動<sup>④</sup>，而對1949年前相對較為開放、多重觀念和資訊競爭的城市環境下，中共革命理念與組織傳播為何依然能收效的問題，仍缺乏深入討論。

以上兩大類研究無論關注中共還是關注香港，無論從較長歷史時段出發，還是從較短歷史斷面切開，基本上都較少涉及香港與作為中共革命的主體——農民以及農村地區進行的革命的關係，也很少從情報傳遞、人員運輸等角度，理解香港在中共革命傳播網絡中所起的關鍵連接點作用。運用農村視角、關注農民動員等研究對於理解中共革命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是研究香港與中共革命的關係也具有重要的意義：一是可以通過將農村與城市連接，賦予農村視角的研究更為豐富的視野；二是可以突破國別史的眼光和框架，憑藉香港在全球信息、人員流動網絡中的特殊地理位置，將中共革命的勝利視為跨國流動網絡的歷史後果之一種，產生更多元的認識；三是有助於勾勒東南亞地區乃至更廣闊範圍的共產革命觀念與組織流動地圖中的中國因素，豐富冷戰史研究。因此，本文利用中共中央檔案、英國殖民地部(Colonial Office)和美國中央情報局(CIA)解密檔案，旨在論述1930年起連接上海、香港與中共農村革命根據地的交通線，以及抗戰之後中共地下網絡在香港的鋪開，探討香港作為中共革命網絡的重要連接點地位的變遷，並論及中共與東南亞乃至蘇聯的革命活動中與香港發生的關聯。

## 一 上海—香港—中央蘇區網絡連接的緣起

中共中央早期的文件曾規定「共產黨員人人都應是一個宣傳者」<sup>⑤</sup>。同時，黨組織採取三人委員會形式，分為(委員長兼)宣傳部、(秘書兼)組織部、工農部三個部門，其中組織部之下的「交通」部門，主要負責「發送秘密宣傳品，組織群眾大會及示威運動」<sup>⑥</sup>。1927年國共合作破裂，中共黨員遭到逮捕屠殺，中共組織與活動逐漸轉入地下。從1927年8月起，中共中央增設了黨報編輯委員會、交通局和出版局，交通部門從組織部剝離成為獨立機關<sup>⑦</sup>。中共全國性秘密交通機關因而開始建立，其機關內部也建立了更為明晰和多層級的中央、省委、縣委三級結構<sup>⑧</sup>。而後，交通局長顧順章以及其他共產黨高層人士的被捕、叛變等事件，使得交通部門的機密性問題進一步受到重視。因此，共產黨公開層面組織機構的工作規模進一步被壓縮，地下交通部門的層級與規模進一步擴張。此時，中共上海中央交通處成為中央與南方局、北方局以及江浙間地下交通的總指揮。上海中央與各級黨委機構之間的具體交通線路包括從上海到滿洲、北平、天津、廣州、漢口等城市，同時也涵蓋從上海到鄂豫皖蘇區、湘鄂西蘇區、湘鄂贛蘇區等根據地<sup>⑨</sup>。在這些彼此或相鄰或分離的根據地之間，也存在着不穩定的交通聯繫<sup>⑩</sup>。

隨着上海中央向蘇區轉移，以上海為中心的地下交通網絡中連接中央蘇區與滬港兩地的交通線變得愈來愈重要。這條線路在影響中共革命甚巨的共產國際幫助下開通。共產國際開始關心中央蘇區問題，主要和1930年前後中國南方城市公開暴動失利以及中共中央在城市的據點被破壞相關。當時《共產國際》發表〈中共的布爾什維克化〉一文，在決定「黨的三項主要任務」中，出現了「建立一個有權威的蘇維埃政府」，「建立一支正規的、訓練有素的紅軍」的說法<sup>①</sup>。

1930年10月，中共中央為貫徹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指示，配合上海中央向蘇區轉移，由周恩來負責部署：在上海舉辦從蘇聯返國準備前往蘇區人員的軍事訓練班，一批軍政幹部如張愛萍、黃火青等參加學習後被派往江西蘇區；安排從蘇聯學習返國的劉伯承、葉劍英、傅鐘、李卓然等把蘇聯紅軍步兵條令和政治工作條例翻譯成中文，並送往蘇區；主持打通比較固定的由上海前往中央蘇區的秘密交通線，雖然這個交通網絡從1928年開始就存在，但是直到1930年，才由閩西特委建立大埔秘密交通站，從而使上海經由香港到達中央蘇區的路線變得較為固定和安全<sup>②</sup>。

此時，在南方幾省的交通要津，共產黨並未佔據優勢。為了連通中央蘇區和上海中央，只能另闢蹊徑，繞過南方腹地的國民黨控制區域；南方一隅的香港（包括相鄰的廣東地區）遂成為交通要道上的中轉站。早在共產國際支持打通這條交通線之前，1930年1月，中共中央就已經在香港九龍設立了南方局秘密電台，與黨中央的電台保持通訊聯繫。而後，中共在香港成立了華南交通總站，直屬黨中央交通局，負責人為原南方局秘書長饒衛華<sup>③</sup>。在這條交通線上，中央蘇區、香港和上海之間不僅傳遞各種重要文件，也傳遞重要物資如食鹽、紙張、藥品、無線電通訊器材等<sup>④</sup>。

上海中央派到蘇區的同志在上海啟程前，通常會先通過地下電台將人數、姓名、性別、政治情況、到香港住何賓館、接頭暗語等電告中共華南地區負責人。如果他們到港後一切情況正常，便由交通員帶領從香港啟程，坐輪船到汕頭，搭潮汕鐵路的火車到潮安，再轉乘韓江小輪到大埔縣城，到達閩粵邊境的清溪鄉，再經由游擊隊控制的永定縣城，到達閩西特委所在地虎崗鄉，最後由特委的武裝護送到達中央蘇區<sup>⑤</sup>。此交通線即為上海—香港—汕頭—潮安—大埔—清溪—永定—虎崗線，又稱閩西線。1930年底，項英肩負上海中央重託，以中共江西蘇區最高負責人身份抵達江西蘇區，對「反AB團」事件進行處理，正是沿這條交通線抵達<sup>⑥</sup>。1933年8月，共產國際駐蘇區軍事顧問李德（Otto Braun）化裝成神父，也是由此路線進入中央蘇區<sup>⑦</sup>。1931年3月，除了閩西線，贛南到香港線也在規劃與建設中<sup>⑧</sup>。10月19日以後，閩西線潮埔段（潮安到大埔）各交通站曾一度被放棄。中央認為應該立即恢復舊有的潮埔段，同時需要再開闢由黃崗直接到清溪而不經過潮汕的線路<sup>⑨</sup>。儘管有些分支路線的變化，總體而言，紅軍長征以前，中共中央領導幹部包括博古、周恩來、鄧小平、劉少奇、胡耀邦、任弼時、陳雲等二百多人，都從這條閩西線進入中央蘇區<sup>⑩</sup>。

據當時閩西交通站大站主任、後擔任廣東省委發行科科長的李沛群回憶，廣東省委領導曾建議，黨中央可以在上海、香港各派遣一個交通科的成

員，另一個則派駐在中途站，這個提議遭到了當時領導交通工作的中央秘書處負責人鄧小平的反對，認為三個交通員都應留在上海等候派遣<sup>⑳</sup>。而先後負責大埔和清溪交通站的站長盧偉良則指認這條線路上共有十個交通員，其中有七八個交通員主要負責往返上海和香港，每月二至三次<sup>㉑</sup>。無論這條線路上的交通員是三人還是七八人，都從側面說明上海仍是1930年代早期中共物資交流與情報傳輸的中心城市，而香港只是一個重要中轉站。

鄧小平拒絕接受在香港安排交通員的建議，可能與當時中共香港黨組織比較渙散有關。中共在香港的黨團活動始於1921年<sup>㉒</sup>，但香港市委黨組織遲至1936年才正式成立<sup>㉓</sup>。1923年，中共準備成立團粵區委，在阮嘯仙等人的組織下，廣州、香港、海豐已經有人活動，更基層的地方團組織也開始建立，但是「派同學〔黨員〕到上海作幫」，「仍找不到相當的人」<sup>㉔</sup>。另外，香港的共產黨吸收入紅軍的工農群眾品質也不佳，多是「1925-1927年革命失敗後，從瓊崖跑到南洋，從東江跑到香港，同時現在還保留着失敗情緒，而又是沒有職業者」<sup>㉕</sup>。這段時期由於廣東黨組織成員與廣東省委、特委失聯，還出現過廣東地方共產主義小組成員集體到上海投奔黨組織的情形。同時，由於前省委鄭蘇因被抓受刑不過而叛變，供出多人，致使與他相關的香港黨員被捕者達五十餘人<sup>㉖</sup>。其時，廣東省的黨團組織負責人與省委特派員之間也有許多矛盾，認為後者理念不正確，並向上級送出書面報告，要求省委調查此名特派員。同時，香港的其他七八位黨員，也被認為「不三不四」，有的甚至被認為是「流氓份子」。其中一位叫歐輝的黨員，被反映「不經組織跑到上海，又由上海跑回來，……不參加實際工作」，最終被開除黨籍<sup>㉗</sup>。

儘管香港存在交通線路不穩定、黨內人員不可靠等問題，但由於時勢很快發生變化，前文提到鄧小平在1930年代不在香港設交通員的顧慮，就變得不合時宜了。

## 二 香港取代上海成為中共海外統戰的中心城市

1933年以後，中共中央在滬組織已被國民黨破壞殆盡。1935年8月，共產國際指示：「上海目前不需要任何中央的組織。」此後，中共在上海只設立辦事處，以維護總部與各地組織的聯繫。至此，上海與北方黨組織的聯繫完全中斷<sup>㉘</sup>。上海作為中共地下交通樞紐的地位不復存在，而香港開始以中共中央「海外部」的名義，凸顯其在農村—城市地下交通網絡中的重要性。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香港淪陷，大量的民主人士被轉移到大後方，另外一批中共宣傳人士和黨外進步人士則流亡南洋地區，繼續從事革命宣傳活動。戰後日軍撤退，港英政府重據香港。隨後國共內戰爆發，在上海負責機要、電台、情報和交通的人員進一步轉移到香港，黨中央在上海印刷的報刊也開始經香港運輸<sup>㉙</sup>。

前文提到，早期香港共產黨組織比較渙散，中共香港市委代表大多不是知識份子出身，而主要以工運領袖為主，如香港市委書記吳有恆、九龍區委書記鍾穴，以及其他三位負責工運的洋務、海員和印刷工人<sup>㉚</sup>；此時中共在香港的主要活動也多與工人和工會相關<sup>㉛</sup>。1937年國共聯合抗戰開始以後，

港澳地區「因不是中心地區」，「特委給予這兩地方的工作是動員兩地的同志回國」，為抗戰服務<sup>33</sup>。中共對粵港地區在抗戰中的部署逐漸發生了變化，香港和臨近廣東地區的情報交通情況也就跟着起了變化。

總體而言，中共在香港的勢力開始增強。軍事方面，廣東省逐漸成為抗日游擊力量活躍的地區。香港淪陷前，中共在新界建立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港九大隊（東江縱隊港九大隊），為武裝搶救華僑、國際友人及物資提供場所<sup>34</sup>。此外，作為中共中央「海外部」的香港還有另外一個重要作用，即統戰中國內地來港的民主人士與黨外知識份子。大量的內地知識份子、進步人士，在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領導人幫助下前往香港。他們的到來，使中共在香港的宣傳情報工作發生了變化。

與抗戰前不同，此時香港地區負責人不再是工運領袖，逐漸成為城市知識份子主導的「精英內閣」<sup>35</sup>。「精英內閣」成員中有不少人員從事宣傳/情報工作，如香港工委的夏衍、章漢夫、喬冠華（又名喬木）、連貫<sup>36</sup>等人。其中喬冠華繼黃作梅後擔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和他的夫人龔澎一起負責重要的情報工作，黃作梅則前往倫敦創辦新華社分社，並試圖與布拉格的組織建立聯繫<sup>37</sup>。他們與來自內地城市（或先前在國統區）的知識份子有着十分密切的關係，或本身就是南下香港的內地知識份子，甚至是中共地下黨員。因此，相比上述負責工運的農民、工人出身的幹部，他們更能理解並同情具有類似知識與教育背景的黨外知識份子、民主人士、技術人員、進步商人，並成功與之結盟<sup>38</sup>。1947年民盟被國民黨宣布為「非法組織」並強行解散後，具有一腔報國情懷的知識精英，如民主黨派重要人士李濟深、柳亞子、鄧初民、章伯鈞、章乃器、馬敘倫、李平心等人，更是將建國的理想寄託於中共建立全國政權之上，在香港實現了立場上的全面左轉，加緊步伐向中共靠攏<sup>39</sup>。在以香港為基地的「南方革命熔爐」中，他們為中共的革命事業提供了重大的人力、財力和意識形態觀念上的支持<sup>40</sup>。

1945年日本投降，港英政府同意與中共談判，允許中共在港設立辦事處與港英當局聯絡，中共順勢要求港英政府幫助其恢復並建立電台。1946至1947年間，中共在北方戰場暫時的軍事失利再次成為香港在革命網絡中的重要性增長的契機。1946年6月，東江縱隊北撤，方方到香港主持工作，加強了黨組織在華南及香港地區革命運動中的領導。儘管東江縱隊3,174名戰士中有2,583名去了山東，但是並未北撤的戰士才是該部隊最精銳的部分：留在南方的人員中有859人是政治指導員，而其中全職的思想與宣傳工作者有143人。這些留下來的思想與宣傳工作者成為戰後中共在粵港地區開展宣傳與情報工作的主力人員<sup>41</sup>。1947年初，中共中央同意廣東游擊隊組織恢復武裝鬥爭，撤銷了原有的中共廣東區黨委，成立了中共香港分局，管轄廣東、廣西和閩西南、滇南、湘南、贛南等地區<sup>42</sup>。雖然香港分局名義上仍歸上海局領導，但是由於通訊技術較為先進和信息環境的相對開放，香港分局常常越級和中共中央聯繫<sup>43</sup>，而原中央蘇區地帶也成為香港分局下轄區域。

1947年之後，中共地下網絡已經在香港全面鋪開。1947年9月宋子文接任國民政府廣東省主席一職後，曾多次訪港，就聯合「反共」事宜，與港英政府交涉。隨着國民黨軍隊在北方戰場的失利，宋子文在1948年4月19日的一

次訪問中，對港英政府施壓，要求其協助國民黨進行「剿匪」行動<sup>44</sup>。此時港英方面依然認為，只要中共人士沒有違反殖民地法律，就不可以逮捕他們。當有大量學生跨過邊境前往廣東內地時，港英政府給英國殖民地部的報告依然認為，這些人前往內地不是因為受到香港共產主義革命宣傳的誘導，而只是由於國內不樂觀的戰爭形勢，致使他們前往內地協助共產黨對抗國民黨，早日結束內戰<sup>45</sup>。

1947年接任香港總督一職的葛量洪 (Alexander Grantham)，在中國有長期生活的經驗，與曾在英國各個殖民地巡迴任職的前任港督楊慕琦 (Mark A. Young) 持相異看法。與楊慕琦主張推動更為激進的憲政改革、促使香港人通過城市國家 (city-state) 的確立而拒絕中國身份認同不同，葛量洪認為完全排除中國對香港身份認同的影響並不現實；默認這種影響並不阻礙香港在中國國內的政治軍事對抗中採取「中立」政策，並與任何中國現任政權合作<sup>46</sup>。但是，他對香港在共產革命中的重要連接點作用，被證明估計不足。

港英政府試圖不開罪國民黨與共產黨兩邊勢力的做法在1948年夏天遭遇了挑戰。這是一個決定香港未來命運走向的關鍵時期：葛量洪終於認識到香港可能已經面臨被共產黨軍事力量控制的威脅。6月葛量洪拍發給英國殖民地部的絕密電文〈1948年上半年年度報告〉中，細密地描述了中共宣傳機構和組織所編織的一張覆蓋香港的巨大網絡<sup>47</sup>；這個網絡遍布香港的通訊社、書店、勞工組織<sup>48</sup>、社會福利機構等。那時，他已基本確定這些龐大的宣傳組織都是在南方局屬下，且直接接受中共政權的領導。而來自中共香港分局的官方文件，表明了其時香港分局的許多決策都直接受中共中央領導，也間接證實了葛量洪的猜測<sup>49</sup>。這封同時抄送英國駐新加坡總領事館的密電，也顯示了東南亞共產主義運動中流血衝突頻發的事態<sup>50</sup>，對香港和新加坡兩地政府都造成了巨大壓力。在東南亞局勢震盪、國共內戰中國國民黨敗局愈趨明顯的時刻，英國外交部就如果國民黨失去中國大陸政權，英國是否應該放棄香港這個問題接受英國議會的質詢<sup>51</sup>。

三個月以後，葛量洪再次拍發密電給英國殖民地部。他認為馬來亞製造的麻煩<sup>52</sup>和國民黨在內戰中的連連失利，讓港英政府抵制共產主義革命運動的壓力陡增，因此他不得不採取更為強硬的行動。至此，港英政府終於下定決心密切監視共產主義運動，也開始了針對香港共產黨組織的全面搜查<sup>53</sup>。

此時，中共通過新華社香港分社建立的廣泛分布於香港、新加坡，以至曼谷、倫敦和紐約的宣傳機構及其分支機構，進一步擴大革命宣傳的影響力；這些機構同時也牽涉到中共海外的籌款活動中。在1948年港英政府對中共香港地下黨相關人士和組織的大搜查中，還發現了部分商業機構也在新華社的控制之下，是內地解放區經費的供給來源。11月，位於新界大埔的榮興 (Wing Hing，音譯) 公司和另一家名叫啟園 (Kai Yuen，音譯) 的公司被港英當局搜查。前者由中共在香港與深圳邊境開設，向走私中國內地貨品的公司徵稅，1944年成立時並無固定的資產和訓練有素的人員。1946年，五名公司職員對該公司進行注資，其中四名為共產黨員。該公司將稅收支付給後一公司，而後者的負責人何啟明是共產黨員，其直接上級是新華社倫敦分社負責人黃作梅。除了與新華社的直接聯繫外，何啟明指出連貫和廣東游擊隊負責

人尹林平在該公司都有投資；公司的收入除了支付給游擊隊組織和中共在香港的組織外，並無其他用途<sup>59</sup>。1949年3月，港英政府在該公司再次繳獲大量來自連貫的港共文件，這些文件成為港督拍發給英國殖民地部有關中共在香港活動的密電的主要內容<sup>60</sup>。

除了牽涉到籌款活動的新華社外，中共在香港的宣傳機構還包括《華商報》、《正報》和《群眾報》，其中《華商報》幾乎可以稱為中共在香港的黨報<sup>61</sup>，發行量超過八千份，一半以上的報紙發行到香港以外的地區，如毗鄰的廣東省。1947年中共華東野戰軍控制了大連、煙台等北方港口以後，與《華商報》實為「前店後廠」關係的新民主出版社，利用香港與中國內地其他港口的連繫，從東北新華書店等解放區書店大量進口書籍和小冊子（包括延安整風時期的學習文件等），並將中共在香港印發的書籍翻印後，經由此線路運送回解放區和國統區<sup>62</sup>。通過先海上、後陸地的交通線路，中共利用《華商報》及其附屬機構，開闢了中國南方—北方海港—延安的情報信息與宣傳物資傳遞線路。這條交通線的一部分，後來也成為1949年前夕中共運輸大批民主人士進入北平參加中共中央新政協會議的路線。

通過這條路線北上參加中共新政權的民主人士與知識份子，有相當部分此前尚聚集在香港達德學院。該學院由中共廣東區委於1946年9月在香港創立，也即東江縱隊北撤三個月之後。如前所述，由於東江縱隊的精銳力量其實留在了粵港地區，他們之中的一部分人則成為達德學院的中堅力量<sup>63</sup>。除此以外，該校也得到民盟等民主人士和左傾知識份子的支持。達德學院的教學語言並非粵語，而是普通話，也從某個側面展示了該學院的教員與學生來源。該學院院長陳其璦是前廣東國民大學副校長和國民黨海外支部書記，因其「左派」觀點被國民黨驅逐，後來成為民盟對外關係部書記<sup>64</sup>。該學院的教員中還有許多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革）或民盟成員，如鄧初民、千家駒、梅龔彬等；部分教員和中國國內的學生運動、香港本地的學運組織也有密切關聯<sup>65</sup>。

1949年2月，葛量洪通過英國外交部發往南京大使館的絕密電文顯示，雖然香港一直在中國國內事務中謹守「中立」政策，但是中共在香港的所為已經「濫用了香港的樂善好施」。因此，中共在香港的重要宣傳基地達德學院於2月22日被港英政府關閉<sup>66</sup>。這是港英政府強硬地阻止共產主義在香港的進一步滲透的實際行動<sup>67</sup>。達德學院被封以後，周恩來迅速得知此事，並立即安排該學院相關人士北上<sup>68</sup>。3月1日，達德學院的五十多名學生即同其他民主人士一起離開香港，一星期後到達天津<sup>69</sup>。

總的來看，二戰以後，香港共產黨組織逐漸形成以知識份子為主力的「精英內閣」，使南下香港的內地知識份子的凝聚力大為增強，民主人士進一步向中共靠攏。除此以外，借助香港相對自由的



中共廣東區委於1946年9月在香港創立達德學院。（圖片來源：劉智鵬：《香港達德學院：中國知識份子的追求與命運》（香港：中華書局，2011））

新聞環境，中共在港組織也領導並實現了在學校、工廠、勞工組織、社會福利機構、商業機構等的廣泛滲透，並連通中國內地的農村革命根據地，全面取代上海成為中共海外統戰的中心城市。

### 三 香港成為東南亞和蘇聯的情報物資匯集中轉地

從太平洋戰爭開始到中共革命勝利前夕，新加坡和蘇聯與中共發生的聯繫，許多都經由香港中介。新加坡作為英國在東南亞總領事館和軍事基地的所在地<sup>⑤</sup>，與香港存在許多交流。新加坡的中共經費籌措者往往來自香港，如鄧文田、鄧文釗兄弟經營的銀行在新加坡為中共籌措活動經費，並得到鄧文釗的親戚、中共海外統戰工作的主要領導人物廖承志的支持和指導。鄧氏兄弟除了是經費籌措方面的重要人物外，也分別是中共在港黨報《華商報》的副總經理和督印人<sup>⑥</sup>。除了鄧氏兄弟這一渠道外，中共另外還有一些輔助性財源，例如民盟成員馬文輝以及香港聖公會主教何明華 (Ronald O. Hall) 等宗教人士，都常為中共發起籌款活動<sup>⑦</sup>。

活躍於東南亞地區的共產黨員和其他革命力量，也常常通過香港與中國國內保持聯繫。1940年，中共重要報人胡愈之在新加坡主持《南洋商報》。1942年新加坡淪陷前夕，他逃往印尼蘇門答臘島避難。1945年9月，胡愈之回到新加坡，創辦《風下》周刊與《南僑日報》。根據胡愈之去世時《人民日報》的報導和相關人士回憶，作為安排撤離中共黨員、香港民主和革命人士計劃的一部分，胡愈之在新加坡的活動任務是由中共中央委派，經由主管統戰工作的周恩來指示傳達<sup>⑧</sup>。胡愈之在1945年9月至1948年4月間發起並領導了民盟馬來亞支部<sup>⑨</sup>。1948年4月他申請護照未獲批准，但仍成功抵達香港<sup>⑩</sup>，數月後潛回北京，後來在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新聞出版總署擔任首任署長一職。除了胡愈之外，原為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的喬冠華也被派往新加坡，後因港英當局懷疑他是延安的胡喬木而被禁止上岸。

中共向新加坡派出的宣傳人士還有後來成為胡愈之夫人的沈茲九，以及另一位香港地區的重要宣傳工作者邵宗漢。邵宗漢是流亡海外的民盟重要成員之一，從事報刊編輯工作，同時擔任中共香港分局對外聯絡部負責人<sup>⑪</sup>。因為從事共產主義活動，抗戰期間流亡蘇門答臘島，被荷印政府驅逐，並被禁止登陸馬來亞群島。1948年6月馬來亞共產黨(馬共)被宣布為非法組織後，他於7月起流亡香港，並繼劉思慕之後擔任《華商報》第二任總編輯。

除胡愈之、沈茲九、邵宗漢等人之外，曾活躍在新加坡和香港地區的人士還包括前國民黨中央社記者、中共地下黨員、周恩來在南方局的舊部劉尊棋<sup>⑫</sup>。1942年初，劉尊棋從新加坡回國，經周恩來批准到重慶的美國戰時新聞處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工作，擔任中文部主任。1949年中共進入北平前夕，劉尊棋成為中共在香港的私營報紙政策大討論的核心發起人之一，在試探在港民主人士和說服更多民主人士與知識份子追隨共產黨北上參加新政協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建國以後，劉尊棋也擔任了重要的外事宣傳領導職務。此外，夏衍也於1946年被派往新加坡，並創辦了《華僑日報》。

香港工委委員饒彰風也差不多同時被派往馬來亞，從事和夏衍相似的宣傳工作。他一年後回港，協助章漢夫經營《華商報》。1948年2月，廖沫沙被派往新加坡創辦新華社新加坡分社<sup>75</sup>。

1948年1月，民盟在香港召開了三中全會，與會代表來自北京、上海和馬來亞<sup>76</sup>。7月，民盟領袖沈鈞儒發表公開聲明，要求馬來亞當局釋放被懷疑捲入馬共恐怖襲擊的民盟人士共二十一人，包括邵宗漢<sup>76</sup>。8月，民革領袖李濟深發表聲明，極力開脫民盟與馬共和荷印共產黨的關係，否認民盟東南亞支部支持東南亞地區的「共產主義恐怖份子」<sup>76</sup>。

1948年12月中旬港英當局搜查連貫寓所時發現的大量文件，則證明中共與東南亞各國共產黨之間在當時仍然存在密切關係<sup>77</sup>。早在1930年代中央蘇區的革命人員運輸過程中，就曾在香港轉移過在東南亞各地參加鬥爭被捕、被當地政府驅逐出境的共產黨員<sup>78</sup>。除了被驅逐出境的東南亞革命者經由香港轉移外，也有來自東南亞地區的共產黨員經香港進入中國南方一帶，長期從事革命運動，甚至抵達過延安和中央蘇區等革命根據地，如1937年在廣東潮州梅縣地區擔任中共韓江工作委員會書記的越南共產黨成員李碧山<sup>79</sup>。據陳瑞璋研究，從1925年起，馬來亞和印尼的共產黨組織就已經作為中共南海支部而存在。1930年以後，又成立了一個獨立的馬來亞支部，由李啟新擔任重要負責人；1934年前後，李啟新成為馬來亞支部書記，後被新加坡政府驅逐出境，返回中國。二戰期間，李啟新是泰國共產黨創立人，也是萊特(Lai Teck)叛逃事件的揭發者。1980年代，他曾官至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根據馬共前書記陳平的回憶，1946年6月，李啟新從泰國到達香港並逗留五個月，期間曾與中共黨員舉行了多次會議，會議召開的地點是《華商報》編輯部<sup>80</sup>。

1948年在《華商報》從事譯電和情報工作的人員<sup>81</sup>，很多為達德學院中來自印尼、新加坡和馬來亞等地的華僑。該學院註冊的250名學生(到1949年關閉前夕已增至600多人<sup>82</sup>)中，除了大量來自中國北方地區的學生(如前東江縱隊成員以及與之聯繫密切的左派人士)和二十五名香港本地人以外，東南亞華僑約佔總數三分之一。

中共除了以新加坡和香港作為網絡連接點，在東南亞地區鋪開共產主義宣傳組織與活動外，還在香港與蘇聯當局進行大量合作。儘管這種合作引起了港英方面的懷疑和調查<sup>83</sup>，但是並沒有影響中蘇雙方的地下合作。來自CIA的解密情報檔案顯示：蘇聯通過香港給予中共軍事與商業方面的其他援助；1940年代以《華商報》為據點的中共在港電台得到了蘇聯資助；方方等人領導的中共游擊武裝也得到在港的蘇聯軍艦的支持<sup>84</sup>。前文提及的在新加坡通過銀行業務為中共籌資的鄧文釗，通過經營公司，經由東北的口岸城市與蘇聯控制的北朝鮮地區進行貿易活動<sup>85</sup>。另外，通過華潤公司的渠道，中國在1948年間曾在香港出售大量的鎢予蘇聯，中國南方的一些省份還從蘇聯進口鈾礦石；裝有電台設備的蘇聯軍艦也在香港逗留，並前往新加坡等其他遠東城市<sup>86</sup>。

1943年共產國際解散以後，蘇聯與中共革命發生關係的渠道也進一步從上海轉移到香港。不過，許多來自香港的共產主義革命宣傳刊物和物資，依然是從上海轉運而來，如蘇聯的貿易公司Exporthleb就經常從上海運輸宣傳品至香港。這家公司在香港設立了辦公室，進口蘇聯出版物和電影。它在香港

的辦事處後來也成為持蘇聯外交與旅遊護照人士的接待站，經由此處，這些人士可以前往廣州或菲律賓、暹羅等地。同時，該公司還派出了蘇聯駐華商務代表，將其辦公室設於廣州，監控該公司在香港的所有運營活動<sup>⑧</sup>。其時，有大量包括《真理報》在內的蘇聯印刷品在香港的書店裏出售<sup>⑨</sup>，從地理分布來看，分發這些刊物的機構多位於中環皇后大道，與八路軍駐港辦事處相鄰。

根據CIA在1948年的資料統計，香港出版共產主義宣傳品的機構一共12家，印刷這些宣傳品的機構有3家，出售它們的書店則有13家<sup>⑩</sup>。這些刊物來自蘇聯駐上海貿易商。在這些刊印共產主義宣傳品的機構中，前文提到的新民主出版社同時也刊印蘇聯文學叢書，這些叢書則直接由莫斯科進口，有中文也有英文，內容涉及斯大林、馬克思、列寧、蘇聯歷史，等等<sup>⑪</sup>。此外，一家在港註冊、有蘇聯背景的中國公司Andar Corporation則是蘇聯電影進入香港的主要渠道，這些電影主要在工人階級聚集的區域播放；這家公司並不十分熱衷播放吸引更多觀眾的美國電影。1948年2至6月間，有七十部蘇聯電影（其中新聞短片佔二十部左右）接受了審查，獲准在香港上映<sup>⑫</sup>。

曾經是中央蘇區與上海交通線上處於海外一隅的中轉站香港，此時已經成為中共在中國大陸最南端的觸角，不僅香港共產黨組織在公開的場合與港英政府較量（如藉戰後的時機要求港英政府幫助中共建立和恢復電台，與港英的宣傳與情報機構對抗<sup>⑬</sup>），以及1948年連貫和方方住所遭到搜查時公開指責港英政府<sup>⑭</sup>），香港也在東南亞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同時在地下的交通網絡中繼續維持和蘇聯的革命聯繫。

## 四 結語

以上的材料與分析展示了中共政權在1930至1940年代從受困江西到向南突圍並最終與世界連接的一個側面。雖然紅軍經過長征到達陝北、創立延安革命根據地的突圍線路似乎才是中國革命研究敘述中關於中國共產黨如何「突破封鎖」的主線，但上海—香港—中央蘇區這條線路，對彼時受困的中共逐漸脫離資訊與其他資源的困境、走向世界舞台起到的作用，雖罕有人提起，卻未見得無足輕重。事實上，它應該與以長征突圍、開闢和經營西北革命根據地和戰場的敘事受到同等的關注。在從江西蘇區突圍，再從上海中央轉移到香港的交通線路變遷中，中共利用香港獨特的地理位置，成功將困於農村地區的中共最終牽引至更為廣闊的城市與沿海地帶，改變了中國革命的信息與宣傳網絡圖景。而1930年代曾經隱於地下的中共革命網絡，一旦假以時日，便開始擴張，並逐步將信息傳遞與宣傳的重心再次從農村轉入城市，直至北上並全面取得大陸政權。

這個線路和網絡為何能夠建立？如果說在封閉信息的環境下，政權一元化的宣傳、情報操作力量的強大不難理解，那麼為何與延安的關門整風不同，在一個開放的信息環境和體系中，中共的意識形態、組織和行動仍能收效？相對開放的城市信息環境（如香港）可以和相對封閉的信息環境（如中國內地）配合實現對接，這種配合對農村地區的情報和人員信息進入城市並找到生存土壤十分有利；而這種接觸之所以能夠實現，與彼時中共集權體制尚未成形

之前，常存在一種半封閉、半渙散的組織形態和情報傳輸狀態有關。戰爭的緊迫與物資的匱乏使情報或物資傳輸部門之間的等級關係不像1949年以後那麼強固，例如中共香港分局能繞過上海分局自行其是，並在不長不短的時間內取代了上海的地位。這種相對寬鬆的信息環境同時也成為中共的交通網絡能夠迅速得到擴展，爭取到國際團體的同情與支持的重要原因。因此，從1930年代以來經由地下的信息系統——並非全然是封閉在農村根據地之間的作品運輸線路，或孤立在城市中的情報組織可見，城市與農村之間的中央政權並非與外隔絕，穿梭於城市與農村之間的秘密交通線成為中共革命前途幽暗之際，中共政權突破局限，取得人員、物資、意識形態支持的重要渠道。

除此以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如果將香港置於英國殖民地的網絡中觀察，我們會發現雖然香港是英國在海外的眾多殖民地中唯一沒有發生民族革命和地方自治運動的地方，但是香港共產黨組織領導的地下革命，卻似乎可視為一種替代性的政治運動。中共能最大程度地在香港自由開放的空間內，以激進的革命理念統戰中間份子，對內連接國內革命根據地，對外從整個東南亞信息網絡獲得資源。

在開放的宣傳網絡上，國共政權更替期的過渡性紊亂中，以及東南亞共產主義革命運動浪潮的推動下，中共成功從農村突圍，展開對香港的學校、勞工組織、社會福利機構等的滲透，建立革命網絡，並經由香港回到國內城市，成功奪取政權。

## 註釋

① Chan Lau Kit-ching, *From Nothing to Nothi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and Hong Kong, 1921-1936* (Hong Kong: Palgrave Macmillan, 1999); Christine Loh, *Underground Fron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江關生：《中共在香港（1949-2012）》，下卷（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1）。

② 葉漢明：〈從「中間派」到「民主黨派」：中國民主同盟在香港（1946-1949）〉，《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6期，頁45-71。

③ 袁小倫：〈戰後初期中共利用香港的策略運作〉，《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6期，頁121-48。

④ 陳永發：《延安的陰影》（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Jeremy Brown and Paul G. Pickowicz, *Dilemmas of Victory: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⑤ 〈教育宣傳問題議決案〉（1922年），載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編：《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文件彙編》，上卷（北京：新華出版社，1980），頁4。

⑥ 〈黨內組織及宣傳教育問題議決案——擴大執行委員會議決〉（1923年），載《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文件彙編》，上卷，頁13。

⑦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工作機構組織序列沿革表〉（1927年8月至1937年7月），載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第二卷，上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頁93。

⑧ 與全國秘密交通機關同時設立的出版委員會，「專掌傳播黨的機關報及中央一切宣傳品的責任」。參見〈黨的組織問題議決案〉（1927年8月7日中央緊急會議決議通過），載《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第八卷，頁135-36。

⑨ 王曉嵐：《中國共產黨報刊發行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頁99-100；粵閩贛邊區黨史編審領導小組：《中共閩粵贛邊區史》（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頁86-87。

- ⑩ 〈中國江西省委組織部工作計劃〉(1927年12月)，載中央檔案館、江西省檔案館編：《江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27年—1928年)》(內部發行，1986)，頁150；〈中共中央關於怎樣加強和開展邊區新區工作的通訊〉(1933年3月17日)、〈中共蕉平尋縣委通告(第十七號)——關於秘密工作問題〉(1933年2月26日)，載中央檔案館、江西省檔案館編：《江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3年—1934年及補遺部分)》(內部發行，1992)，頁206、17-18。
- ⑪ 《共產國際的戰略和策略》的內容，參見〈共產國際執委會就李立三的政策給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信(節錄)〉(1930年11月16日)，載德格拉斯(J. Degras)選編，李匡武等譯：《共產國際文件(1929-1943)》，第三卷(北京：東方出版社，1986)，頁165、167；另參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1930年6月)，載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編譯：《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1929-1936)》，第二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頁93-94。
- ⑫ 參見王曉嵐：《中國共產黨報刊發行史》，頁100。
- ⑬ 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編：《1921-1933：中共中央在上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頁244。1939年以後饒衛華任中共廣東省委員會東江特委組織部長。參見尹林平：〈艱難曲折的戰鬥歷程——回憶中共廣東黨組織的鬥爭歷史〉，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廣東文史資料》，第三十八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3)，頁6。
- ⑭ 〈交通路線圖及序言〉，載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委員會、中共汕頭市委黨史資料徵集研究領導小組編：《紅色交通線》(廣州：內部發行，1986)，無頁碼；李沛群：〈周恩來同志進入閩西蘇區的經過情況〉，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廣東文史資料》，第二十八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0)，頁22-42、26。
- ⑮⑯⑰ 饒衛華：〈回憶華南交通總站的建立和工作情況〉，載《紅色交通線》，頁113-14；117；116。
- ⑱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1)，頁27。
- ⑲ 蔡孝乾：《台灣人的長征記錄：江西蘇區紅軍西竄回憶》(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2)，頁138。
- ⑳ 〈中共兩廣省委給中央的報告——新省委的組織、檢查過去工作錯誤和安排今後工作〉(1931年3月29日)，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編：《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1)》，甲19(內部發行，1984)，頁76。
- ㉑ 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編：《廣東廣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索引(1921-1936)》，第一冊(內部發行，1986)，頁356-57。
- ㉒ 《1921-1933：中共中央在上海》，頁244；盧偉良：〈回憶在大埔交通站的戰鬥生活〉，載《廣東文史資料》，第二十八輯，頁12-21。
- ㉓ 李沛群：〈回憶解放前黨的地下交通工作〉，《黨史資料叢刊》，1982年第1輯。轉引自《紅色交通線》，頁94。
- ㉔ 盧偉良：〈回憶在大埔交通站的戰鬥生活〉，頁14。
- ㉕ 〈廣州共產黨的報告〉(1921年)，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編：《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21-1926)》，甲6(內部發行，1983)，頁1-6。
- ㉖ 〈吳有恆關於香港市委工作給中央的報告——1936年9月至1939年11月香港的政治環境和黨的組織、群運、統戰等工作〉(1941年2月16日)，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編：《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8-1941)》，甲44(內部發行，1988)，頁331。
- ㉗ 〈嘯仙覆實庵信——準備成立粵區委及各地工作開展情況〉(1923年9月30日)，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編：《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22-1924)》，甲1(內部發行，1983)，頁103-106。
- ㉘ 〈香港工代會擴大紅軍委員會給省委的報告——組織香港工人參加紅軍的工作情況〉(1931年2月1日)，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編：《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27-1932)》，甲25(內部發行，1983)，頁253。
- ㉙ 〈△△△出獄同志的報告——南石頭特支成立經過及獄中情況〉(1929年11月22日)，載《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27-1932)》，甲25，頁105。

- ⑳ 〈團廣東省巡視員給中央的報告(第一號)——省委本身情況、各地工作情況〉(1931年10月13日);〈唐洵巡視廣東的報告——省委、東江、瓊崖、惠陽、北江工作情況〉(1931年11月1日),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編:《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1)》,甲35(內部發行,1984),頁257;303、308。
- ㉑ 〈中共上海中央局及群眾團體組織〉,載《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第二卷,上冊,頁240-44。
- ㉒ 〈中共香港市委致中央電——香港出席黨的七次代表大會代表名單〉(1939年),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8-1941)》,甲44,頁41。
- ㉓ 1939年7月25日,香港印刷工會中文報館工人復工。參見〈香港印刷業工會中文報館工友復工後告各界人士書〉(1939年7月25日),載《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8-1941)》,甲44,頁5。中共香港地區的負責人周小鼎曾在中華書局做過四五年印刷工,後在1940年12月到達延安,住在馬列學院。參見〈周小鼎關於香港中華書局分廠黨總支工作的談話記錄〉(1941年1月11日、13日),載《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8-1941)》,甲44,頁73。
- ㉔ 〈廣東工作報告——PELP工作報告及粵東南特委工作報告〉(1939年1月29日),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編:《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7-1939)》,甲36(內部發行,1987),頁361。
- ㉕ 〈林平致中央並恩來電——關於我與英國統戰工作問題〉(1943年4月20日),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編:《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41-1945)》,甲38(內部發行,1987),頁253。
- ㉖ 袁小倫:〈戰後初期中共利用香港的策略運作〉,頁121-48;張報:〈二三十年代在美國的中國革命黨人〉,載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國際共運史研究室編:《國際共運史研究資料》,第七輯(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頁150-61。
- ㉗ 連貫是中共在香港的對外公開身份的黨員,同時也是香港分局負責對外聯絡、統戰職責的重要領導成員。
- ㉘ 本文使用的香港政府檔案處歷史檔案館檔案,主要包括如下案卷:(1)HKMS184-1-39及HKMS184-1-40, Chinese Communist Activities in Hong Kong, 1948;(2)HKMS184-1-62, Communist Activities in Hong Kong (with Top Secret Annex), 1949;(3)HKMS184-1-63, Communist Activities in Hong Kong, 1949;(4)HKMS184-2-10, China Democratic League(下引註明HKMS編號及膠卷編碼頁數)。參見“(Secret), Report on Communist Activities in Hong Kong for the Six Months Ending 31st December, 1948”(11 January 1949), “Information Work in Hong Kong”, HKMS184-1-62,227;“(Top Secret) Chinese Communist in Hong Kong”, HKMS184-1-63, 115;“(Secre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Hong Kong”(30 June 1949), HKMS184-1-63, 108-27;“(Confidential) L. H. Lamb, Esq., C.M.G., O.B.E., British Embassy, Nanking, c.c.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2 December 1948), HKMS184-1-39, 22; Chan Sui-jeung, *East River Column: Hong Kong Guerrillas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After*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129。
- ㉙㉚ “Political Information: Communist Activities: Hong Kong”(9 January 1947), CIA-RDP82-00457R000200520002-4, [www.cia.gov/library/readingroom/document/cia-rdp82-00457r000200520002-4](http://www.cia.gov/library/readingroom/document/cia-rdp82-00457r000200520002-4)。
- ㉛ 葉漢明:〈從「中間派」到「民主黨派」〉,頁45-71;錢之光:〈接送民主人士進入解放區參加新政協〉,載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中華文史資料文庫》,第七卷(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6),頁932;《南方日報》、廣東《華商報》史學會合編:《華商報史話》(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1);陳敦德:《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紀實》(香港:中華書局,2012);《連貫同志紀念文集》編寫組:《賢者不朽:連貫同志紀念文集》(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1995)。
- ㉜ 薩沅:〈熱心公益無事忙,有求必應香港腳——記父親薩空了在《華商報》的日子〉、李湄:〈鄧文釗與《華商報》〉,載《華商報史話》,頁35、37;“Political Information: Communist Activities: Hong Kong”(9 January 1947);袁小倫:〈戰

後初期中共利用香港的策略運作》，頁 121-48；葉漢明：〈從「中間派」到「民主黨派」〉，頁 45-71；葉漢明：〈香港與四十年代中國民主運動的邊緣化〉，《史藪》，第 3 卷（1998 年 12 月），頁 323-56；葉漢明、蔡寶瓊：〈殖民地與文化霸權：香港與四十年代後期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2001 年新第 10 期，頁 191-218。

①⑧⑩ Chan Sui-jeung, *East River Column*, 129; 129; 131.

⑫ 〈中共中央關於設立香港分局的指示〉（1947 年 5 月 6 日），載廣東省檔案館編：《華南黨組織檔案選編（1945 年—1949 年）》（內部發行，1982），頁 47-48；尹林平：〈艱難曲折的戰鬥歷程〉，頁 20。

⑬⑭ “Political Information: Communist Activities: Hong Kong” (4 February 1947), CIA-RDP82-00457R000300360008-5, www.cia.gov/library/readingroom/document/cia-rdp82-00457r000300360008-5.

⑮ “Extract from Savingram No.27 Secret dated 26th April, 1948”, from Governor, Hong Kong to British Embassy Nanking No.18: Consul General, Canton No. 38: Special Commissioner, Singapore No.132”, HKMS184-1-39, 117.

⑯ “(Secret) Extract from Savingram No.41 from Hong Ko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dated 8th June, 1948”, HKMS184-1-39, 114.

⑰⑱ WM. Roger Louis, “Hong Kong: The Critical Phase, 1945-1949”,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2, no. 4 (1997): 1070, 1084; 1074.

⑲⑳ “(Secret) Grantham to Arthur Creech Jones, M.P., Repeated to Commissioner General, South East Asia, British Embassy, Nanking, G.O.C.” (2 April 1949), HKMS184-1-39, 86-88; 86-94.

㉑ 根據 CIA 的調查，中共在 1947 年控制的工會已經達到三十家。參見 “Political Information: Communist Activities: Hong Kong” (9 January 1947)。

㉒ 〈羅邁致中央電——對華南局面擬我部署〉（1947 年 5 月 7 日）、〈香港分局關於接受中央二月一日指示的決議〉（1947 年 5 月 20 日）、〈方方致中央及統戰部電（絕密）——香港分局擬縮小組織機構〉（1948 年 12 月 15 日）、〈香港分局致中央電——粵保安團編制情形〉（1948 年 12 月 2 日），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件彙集（1947.5-1949.3）》（內部發行，1989），頁 1-3、4-9、272-74、276-77。

㉓ 藤布爾 (C. M. Turnbull) 著，歐陽敏譯：《新加坡史》（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3），頁 319。同時，泰國政府發起進步社團、學校大搜捕。參見江關生：《中共在香港（1949-2012）》，下卷，頁 149。

㉔ 1948 年 5 至 6 月間，馬來亞發生了一系列暴力事件。馬來亞從此開始宣布進入緊急狀態，這種狀態持續了十二年。隨後，新加坡也實行了緊急狀態，集會、結社和罷工均被禁止，並宣布馬來亞共產黨為非法組織。

㉕ 參見 “(Top Secret) Grantham to Arthur Creech Jones, M.P.” (6 September 1948), HKMS184-1-40, 20-23。另外，根據左派人士的敘述，港英政府此時對中共革命未加以干涉和制約，主要是因為 1946 年 7 月國民政府外交部派員與港督楊慕琦接觸，要派駐官員進入九龍城寨維持治權。港英政府在 1946 年秋冬之交對左派力量的容忍，主要是為了扶持左派以抵制和削弱國民黨在工運中的勢力。參見周奕：《香港左派鬥爭史》（香港：利文出版社，2002），頁 11。

㉖⑳㉑ “(Secret) Hong Kong, Report on Communist Activities in Hong Kong for the Six Months Ending 31st December, 1948” (11 January 1949), HKMS184-1-62, 284; 279; 283.

㉒ 港督在 1948 年 12 月至 1949 年 3 月間拍發的密電包括：(1) “(Top Secret) Document Seized at No.4 Tin Hau Temple Road, 3rd floor, Hong Kong” (13 December 1948, 最先發送的連貫秘密日記英文翻譯件、聯合會議參與人的發言內容等)；(2) “(Top Secret) Savingram from the Governor, Hong Kong to the British Embassy, Nanking, No.7” (30 December 1948, 日記其他部分的擇要翻譯、對日記內容的評論和分析等)；(3) “(Secret) Chinese Communists” (8 March 1949, 在各種材料綜合基礎上對中共政策的總結報告)。參見 HKMS184-1-61,

Communist Activities in Hong Kong, 1948-1949。其中，1948年12月11日的搜查，發現了連貫文件中包含一份他向啟園公司何啟明支付1萬元支票的記錄，參見“(Secret) Hong Kong, Report on Communist Activities in Hong Kong for the Six Months Ending 31st December, 1948” (11 January 1949), 279, 284。

⑤⑥ 《華商報》除了是港共舉行秘密會議的場所，也是中共在港電台設立處。參見“Political Information: Communist Activities: Hong Kong” (4 February 1947)。

⑤⑦ 該出版社也在東南亞設有分銷處。1949年廣州解放後，在該出版社基礎上設立了廣州新華書店，後更名為新華書店華南總分店，並在此基礎上設立了華南人民出版社。參見金炳亮：〈論香港新民主出版社（1946年3月—1949年10月）〉，載廣東省新聞出版局、《廣東出版史料》編輯部編：《廣東出版史料》，第一輯（廣州：內部發行，1990），頁151-54；吳仲：〈回憶香港新民主出版社和到廣州建立新華書店〉，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廣東文史資料》，第五十二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7），頁176-203。

⑤⑧ “(Top Secret) Grantham to Arthur Creech Jones, M.P.”, Copied to British Embassy, Nanking, Commissioner-General, S.E.A. (2 April 1949), HKMS184-1-62, 204.

⑤⑨ 〈香港分局致中央及統戰部電——達德學院被封經過〉（1949年3月2日），載《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件彙集（1947.5-1949.3）》，頁448；“Information Work in Hong Kong”, HKMS184-1-62, 100。

⑤⑩ “(Top Secret) Chinese Communist in Hong Kong”, Savingram from the Governor of Hong Kong, for Foreign Office Concurrence before Dispatch, Repeated to H.B.M.'s Ambassador, Nanking (17 January 1949), HKMS 184-1-62, 241-44.

⑤⑪ 〈香港分局致中央及統戰部電——達德學院被封經過〉，頁448，註釋1；劉智鵬：《香港達德學院：中國知識份子的追求與命運》（香港：中華書局，2011），頁148-51。

⑤⑫ 江關生：《中共在香港（1921-1949）》，上卷，頁286。

⑤⑬ 藤布爾：《新加坡史》，頁297。

⑤⑭ 薩沅：〈熱心公益無事忙，有求必應香港腳〉，頁35；李湄：〈鄧文釗與《華商報》〉，頁37。

⑤⑮ 〈胡愈之同志生平〉，《人民日報》，1986年1月23日，第4版。另一部分人士留港參加達德學院的工作。參見連貫：〈粵港工委和撤退工作〉，載中共中央江蘇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中共南京市委黨史資料徵集編研委員會、中共代表團梅園新村紀念館編：《中共中央南京局》（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0），頁397。

⑤⑯ 胡愈之：〈南洋雜憶〉；張楚琨：〈後記——記胡愈之、沈茲九在南洋的戰鬥和流亡〉，載胡愈之、沈茲九：《流亡在赤道線上》（北京：三聯書店，1985），頁81-82、85-86；127。

⑤⑰ “(Secret) Grantham to Arthur Creech Jones, M.P., Repeated to Commissioner General, South East Asia, British Embassy, Nanking, G.O.C.”, 86-93. 另參見“Some Leading Communists Who Recently Arrived from Malaya”; “Extract from: Review of Chinese Affairs, April 1948”, HKMS184-2-10, 25。

⑤⑱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Hong Kong” (30 June 1949), 127.

⑤⑲ 蔡馥生：〈到南洋工作的回憶〉，載中共廣東省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委員會編：《廣東黨史資料》，第十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7），頁122；張楚琨：〈後記〉，頁127。

⑤⑳ 參見“Activities of Chinese Opposition Parties in Hong Kong”, (Important) Inward Telegram from Hong Kong (Sir A. Grantham) to the Secretary of the State for the Colonies (8 January 1948), HKMS184-2-10, 61。

㉑ “Shen Jun-ju. China Democratic League to His Excellency Mr. Arthur, Creech Jones, The Colonial Secretary, London” (16 July 1948), HKMS184-2-10, 21; “Extract from Secret Savingram No. 53 from Hong Kong to Secretary of State dated 7th July, 1948”, HKMS184-2-10, 24; “(Secret) Hong Kong,

Report on Communist Activities in Hong Kong for the Six Months Ending 31st December, 1948” (11 January 1949), 279; “Appendix II”,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Hong Kong” (30 June 1949), 140; 邵宗漢及同仁照片介紹文字，參見〈當年風采〉，載《華商報史話》，頁41。

⑯ “(Confidential) From Singapore to Foreign Office, Addressed to Hong Kong Governor, Repeated for Information to Nanking and Foreign Office” (17 August 1948), HKMS184-2-10, 16.

⑰ 〈碧山致中央並轉新華社電——關於新聞工作幾點建議〉(1946年2月21日)、〈碧山致中央電：國黨違法進攻與我對策〉(1946年3月3日)，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編：《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45-1949)》，甲58(內部發行，1989)，頁304-306、307-308；溫碧珍：〈回憶李碧山在中國的革命活動〉，載《廣東黨史資料》，第十輯，頁5；雲廣英：〈抗日戰爭爆發前後我黨在廣東開展工作的回憶〉，載《廣東文史資料》，第二十八輯，頁2。

⑱ Chan Sui-jeung, *East River Column*, 131-32. 萊特叛逃事件是指1942年9月1日，馬共根據總書記萊特的命令，召集各地黨組織和部隊領導人到雪蘭莪州黑風洞地區開會，結果遭到日軍圍殲。事後查明，1942年向日本人提供黑風洞會議消息，致使馬共領導層受到毀滅性打擊的，恰恰是總書記萊特。後來，也是因萊特出賣，馬共另一領導人蔡克明在新加坡被捕犧牲。其後萊特捲款逃亡被擊斃。

⑲ 楊喬：〈密室裏的日日夜夜〉，載《華商報史話》，頁40、69。

⑳ “Extracts from Secret Savingram No. 51 from the Governor, Hong Ko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dated 16th March, 1949”, HKMS184-1-62, 213.

㉑ “Report on Soviet Activities in Hong Kong, during the Six Months Ending 31st December, 1948” (日期不詳), HKMS184-1-62, 219; 219-20.

㉒ “Political Information: Communist Activities: Hong Kong, Canton Area” (20 February 1947), CIA-RDP82-00457R0040028006-5, www.cia.gov/library/readingroom/document/cia-rdp82-00457r0040028006-5.

㉓ 目前沒有關於這些軍艦上電台活動的更多證據，但是攜帶電台設備的蘇聯軍艦，極有可能與同樣攜帶移動電台設備的香港共產黨組織及其在新加坡等地的共產革命人士取得密切聯繫。參見“Savingram,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from the Governor of Hong Kong. 12th March, 1948, No.17, Secret”, “Soviet Propaganda in Hong Kong”, HKMS184-1-39, 86-87; “Report on Soviet Activities in Hong Kong, during the Six Months Ending 31st December, 1948”, 220-21。

㉔ 該公司的官方機構於1947年底撤離香港，但事實上在此之後仍以非官方身份活動。參見“Savingram,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from the Governor of Hong Kong. 12th March, 1948, No.17, Secret”, 86-87; “Report on Soviet Activities in Hong Kong, during the Six Months Ending 31st December, 1948”, 219。

㉕ “Political Information: Communist Activities: Hong Kong” (15 September 1948), CIA-RDP82-00457R001801020008-5, www.cia.gov/library/readingroom/document/cia-rdp82-00457r001801020008-5.

㉖ 1946年1月《華商報》復刊後，新民主出版社由該報出版經費支持創立，是中共在香港設立的正式出版機構。參見金炳亮：〈論香港新民主出版社(1946年3月—1949年10月)〉，頁151-54；“Report on Soviet Activities in Hong Kong, during the Six Months Ending 31st December, 1948”, 219-20。

㉗ 〈林平致中央電——關於我與英方談判的初步結果〉(1945年10月9日)，載《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41-1945)》，甲36，頁529。

㉘ 方方：〈方方致中央及統戰部電(絕密)——香港分局擬縮小組織機構〉，頁276。